

口述文本之形成与真实性辨析

——以《孔府内宅轶事——孔子后裔的回忆》为例^{*}

孔 勇

【提要】 口述历史是历史记忆的重要承载形式。保存口述回忆和形成口述文本的程序是否规范,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口述内容的真实性与可信度。由于主客观因素影响,孔德懋回忆口述、柯兰整理写成的《孔府内宅轶事》披露的诸多“轶事”不乏失实之处,影响了其史料利用价值。本文选取其中三个重要案例,经考辨认为,“公主下嫁孔府”系历史上子虚乌有之事,“陶氏毒杀王氏”亦与事实存在偏离,“子见南子”风波则有误记夸大成分。三则案例分别对应“遥忆”“追忆”和“补忆”等口述回忆类型,更多折射出口述者对历史事件的当下认知,而非历史事实的原貌呈现,但也由此揭示了新的“历史事实”。

【关键词】 《孔府内宅轶事》 口述文本 口述史料 真实性 历史记忆

1982年,一本标称孔德懋“回忆口述”、柯兰“整理写成”的著作《孔府内宅轶事——孔子后裔的回忆》(以下简称《孔府内宅轶事》),由天津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由于口述者系孔子第七十七代女孙,幼时生长于曲阜孔府,该书引起了广泛关注,被视为了解孔府内宅生活的一手资料。^①此后数年间,该书一再重印,并译成英、日、法、西班牙等外文,产生了持久影响力。1985年,北美口述历史协会主办的《口述历史评论》(*The Oral History Review*)立足于口述史学的规范对《孔府内宅轶事》加以评介。撰文者威廉·莫斯(William W. Moss)称其为“有自我意识的一部口述历史,即使不是新中国最早的一部,也是最早的一批此类出版物”,所以“尤其值得我们关注与讨论”。^②而同时期的国内学界未从口述史学层面关注和讨论该书。时至今日,在各类关于中国口述史学的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衍圣公研究”(项目编号:19CZS031)的阶段性成果。

① 典型的例子,如汪士淳为孔德懋胞弟、末代衍圣公孔德成所作传记《儒者行》一书,述及孔德成的出生过程、七十六世衍圣公孔令贻的葬礼、孔德成读书学习情况和童年趣事、《子见南子》案发生时孔府反应等,均以《孔府内宅轶事》作为一手资料;黄进兴则采信孔德懋关于“乾隆公主嫁孔府”的叙述,将其看作清廷推恩孔府的重要证据;赵荣光描写孔德成的生母王氏、民国初年孔府内宅的饮食起居等情形,李俊领探究1934年8月27日国民党中央的祭孔仪典时,也均引用了孔德懋著作。美国学者Christopher S. Agnew在其专著《曲阜孔氏》中,多处以《孔府内宅轶事》的记载为信史,涉及民初孔府经济状况、孔德成继母陶氏对其生母王氏的虐待等。以上分别参见汪士淳《儒者行:孔德成先生传》,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42、50、54、59—61、72页;黄进兴《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修订版),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92页;赵荣光《〈衍圣公府档案〉食事研究》,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106页;李俊领《抗战时期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孔子的祭祀典礼》,《社会科学评论》2008年第4期;Christopher S. Agnew, *The Kongs of Qufu: The Descendants of Confuciu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9, pp. 168, 174.

② William W. Moss, “Reviewed Work(s): In the Mansion of Confucius’ Descendants: An Oral History by Kong Demao and Ke Lan”, *The Oral History Review*, Vol. 13, 1985, p. 162.

回顾中,^①《孔府内宅轶事》仍旧处于缺席状态,以致它所记述重要事件是否真实与准确等问题,依然未能得到深入揭示和讨论。鉴于此,本文拟聚焦《孔府内宅轶事》这一口述文本个案,在梳理其形成过程和基本内容的基础上,着重辨析其中包含的三种有代表性的口述记忆类型及其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

一、《孔府内宅轶事》的形成和内容

《孔府内宅轶事》系柯兰根据其母孔德懋的回忆口述而整理写成。柯兰提到出版该书时的两个想法,一是“文革”结束之后,社会上逐渐恢复了孔子的历史地位,写作此书有助于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二是孔府作为一个“最能体现封建道德、传统、礼教的活样板”,通过披露其内宅生活,“能对人们认识封建主义,多少有一些参考价值”。^②从口述史学的视角看,柯兰并没有明确区分其母“回忆口述”和她“整理写作”之间的关系,而恰恰是口述者的特殊身份,才是这本书受到关注的根本原因。因此,探究《孔府内宅轶事》如何形成,需要综合考虑当时的社会背景去进一步追寻。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各界解放思想,曾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的孔氏近支后裔,重新走入公众视野。1979年夏,孔德懋偕同柯兰回到阔别数十年的家乡曲阜,住进了政府为她修葺一新的孔府庭院。^③笔者曾采访与孔德懋母女皆有深交且参与了那次接待的曲阜师范大学教授骆承烈,据他回忆“柯兰是孔家的外孙女,想着来曲阜一趟不容易,来了之后就到处去了解情况,要回去写一本书”,后来出的书“跟孔德懋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是托她的名,一切都是柯兰写的”。^④孔德懋在为柯兰的一本书所作序文中也写道“1980年(此处应为1981年——引者注)适逢政通明和之时,以我的名义发表的《孔府内宅轶事》,实际就是她写的。”^⑤综合来看,该书内容主要由柯兰执笔写成,却也不能否认孔德懋“回忆口述”的重要作用。^⑥

1981年1月,《孔府内宅轶事》的主体内容曾在《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发表,共有五个部分:“‘天下第一家’”“两代衍圣公”“闭塞的童年岁月”“姐妹俩的遭遇”“我的小弟孔德成”。文中从孔子以降孔氏家族的形成和发展谈起,重点落脚到孔德懋耳闻目睹的清末民初孔府内宅生活,包括末代衍圣公孔德成的诞生、承继及其学习成长,孔府与国民政府的密切关系等内容,时间下限截止到抗战结束,这也奠定了此后所出同名书的基本框架。^⑦次年初,即《孔府内宅轶事》作为专书出版之际,《读书》杂志第1期刊文推介,并附有全书七章标题:“天下第一家”“我的父亲与母亲”“内宅生活”“姐妹俩”“孔德成大婚盛典”“动乱时期”“重返故乡”。专书内容有所扩充,尤其增加了改革开

① 相关回顾和评述,参见左玉河《中国口述史研究现状与口述历史学科建设》,《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4期;邓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视角下的口述史研究》,《成都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唐恒、戚筠《近十年我国口述史研究现状——基于文献计量与可视化分析》,《图书情报研究》2019年第3期;张德明《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口述历史理论研究回顾》,《湖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② 孔德懋《孔府内宅轶事——孔子后裔的回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印,第155—156页。按:以下如无特殊说明,均指该版本。

③ 祥民《孔德懋回故里探亲访友》,政协曲阜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曲阜文史》第1辑,1982年印,第27—29页。

④ 参见笔者对骆承烈的访谈。访谈时间:2019年12月20日上午10:00—12:00,访谈地点:曲阜师范大学骆承烈家中。

⑤ 柯兰《千年孔府的最后—代》,天津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序”(孔德懋),第1页。

⑥ 参见笔者对曲阜孔子研究院研究员杨朝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曲阜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王强的访谈。访谈时间及地点分别为:2020年1月21日上午9:00—10:00,曲阜孔子研究院杨朝明办公室;2020年1月22日上午9:00—11:00,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曲阜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王强办公室。

⑦ 孔德懋《孔府内宅轶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7页。

放以后孔德懋偕女柯兰等人重返曲阜孔府所见所闻。

基于前期的铺垫和宣传,1982年《孔府内宅轶事》首版首印即达48700册,成为20世纪80年代初风行一时的畅销作品。同年,《中国建设》杂志以《孔府生活杂忆》为题,连续11期刊载了书中内容,“受到读者的欢迎”。^①香港《大成》杂志也转登了其中两节,均与孔德懋父母身世和胞弟孔德成有关,扩大了该书在海外的影响。^②随后数年间,海内外相继出现了《孔府内宅轶事》的中文繁体、英文、日文、法文、西班牙文等多种版本,进一步扩大了其读者群体。

阅读史的视角和方法有助于我们加深理解《孔府内宅轶事》的流通履迹和阅读体验。该书出版后最值得关注的阅读反应,出自孔德懋的胞弟孔德成。孔德成,字玉汝,号达生,1920年生于孔府,系孔子第七十七代孙,出生不久袭爵“衍圣公”,1935年改封“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1949年后担任台湾大学教授等职,2008年病逝于台北。有资料显示,孔德成第一时间阅读了《大成》杂志刊载的孔德懋两文,尤其文中提到自己生母王氏系被继母陶氏下毒致死一说,令他“很感难过,曾三日不欢不语”。^③1982年5月15日,孔德成撰就《吾家大事》一文,寄交《大成》杂志,并在随文附函中说明,此为对孔德懋两篇文章之“补述”。^④按其内容,重点在于澄清生母王氏死于“产褥热”,属正常亡故。他在附信中还说“至文中应再补述者,容续写之”,只是“或因公忙,或因其他顾虑,并未续写”。^⑤因此,《吾家大事》一文也是孔德成对孔德懋的唯一公开回应。

不知是信息阻滞,还是有意忽略,孔德懋、柯兰一开始显然没有受到孔德成意见的影响。1988年的《孔府内宅轶事》修订本仅仅对读者来信提出的“一些缺点、错误”做了改正和修订,补充了一些细节,却仍然坚主陶氏虐杀王氏。^⑥直到1996年7月,天津《今晚报》连载以柯兰署名的长文《千年孔府的最后—代》,文中才删去王氏被陶氏毒杀的描述,^⑦折射出作者当时受到更多家族内外回应的影响。^⑧但这种影响并未根本改变孔德懋对“毒杀”之说的坚持,后来她仍认为“陶氏生性残暴善妒,平时对宝翠(即王氏)就很虐待”,孔德成出生后,“陶氏密令心腹给宝翠端去一碗毒药让她喝下”。^⑨

前引威廉·莫斯的评介虽然肯定了《孔府内宅轶事》值得关注,但也说它“显然是一部为了旅游业的通俗作品,而不是一部严肃的对过去的学术调查”,并从口述规范角度提出疑问“我们得知孔德懋的回忆是叙述给她的女儿柯兰,然后由柯兰整理出版,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未经整理加工的材料是什么样,或者原始口述的味道有多少被丢失了。”^⑩英国学者裴达礼(Hugh D. R. Baker)在阅读孔德懋书后评论道“这不是一部经过充分研究的作品”,“据推测,她的女儿、合著者柯兰的角色是倾听者。”^⑪

① 铁婴《访孔子第七十七代嫡孙女孔德懋》,《中国建设》1983年第9期。

② 孔德懋《天下第一家 两代衍圣公》《我的弟弟孔德成》,《大成》第99、100期,1982年2月、3月。

③ 孔令朋《今生今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322页。

④ 孔德成《吾家大事(选载)》,台北《传记文学》第53卷第3期,1988年9月。

⑤ 孔德成《吾家大事(选载)》,台北《传记文学》第53卷第3期,“编者后记”,1988年9月。

⑥ 孔德懋《孔府内宅轶事——孔子后裔的回忆》(修订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2—93、200页。

⑦ 柯兰《千年孔府的最后—代》,第59页。

⑧ 具体细节参见孔令朋《今生今世》,第316—328页;孔令朋《孔裔谈礼》,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85—104页;赵荣光:《〈衍圣公府档案〉食事研究》,第108—112页。

⑨ 邱健《孔德懋从圣府闺秀到社会活动家》,《炎黄春秋》1999年第9期。

⑩ William W. Moss, “Reviewed Work(s): In the Mansion of Confucius’ Descendants: An Oral History by Kong Demao and Ke Lan”, *The Oral History Review*, Vol. 13, 1985, p. 162.

⑪ Hugh D. R. Baker, “Reviewed Work(s): The House of Confucius by Kong Demao and Ke La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19, Sep 1989, p. 661.

无论怎样的阅读反应,归根结底都是围绕《孔府内宅轶事》文本内容而生,也即书中记载的那些轶事。下面,笔者将聚焦《孔府内宅轶事》这一文本,择取其中最具影响的三则典型案例展开分析,即“公主下嫁孔府”“陶氏毒杀王氏”和“《子见南子》演剧风波”。它们恰恰对应了三种不同的口述回忆类型,笔者分别称之为“遥忆”“追忆”和“补忆”。所谓“遥忆”,是指口述者对距离自己所处时代较远、并非亲历亲见的史事的描述,其资料素材大多来自文字记载或口头传说,部分难有确证的内容很可能存在演绎成分;“追忆”主要是指,口述者在追述一些得自传闻或记忆模糊的往事之时,掺杂了想象或情感的成分;“补忆”即口述者对于早年自身周围发生的一些事件,在事发时并不一定有深刻记忆或亲身见闻,却在后来随着此事意义逐渐凸显而补充、夸大了自身所扮演的角色及参与程度。应该说,这三种口述回忆类型存在于诸多口述文本之中,有必要结合相关档案和文献,一方面还原其各自真实样态,另一方面尝试分析忆述失实的深层原因,以此全面看待口述文本的史料利用价值。

二、子虚乌有:遥忆“公主下嫁孔府”

一般认为,口述历史最受推崇的价值之一是保存了即将逝去的声音,但这些声音是否属于“三亲”(亲历、亲见、亲闻)范围,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声音,背后受到哪些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决定了读者从何种层面评估口述文本的价值。对以上问题,《孔府内宅轶事》中生动呈现却不属于口述者“三亲”之列的“公主下嫁孔府”一事,可以提供一定的理论反思。

按照书中叙述,所谓“公主下嫁孔府”是指:乾隆帝有个十分钟爱的公主,因其面有黑痣,相术主灾,“破灾的唯一办法是将公主嫁给比王公大臣更显贵的人家,这就只有远嫁孔府了”。乾隆帝第一次到曲阜祭孔时,确定了这门亲事,且为了避开满汉不能通婚的规制,特将公主寄养在汉人大学士于敏中府中,后以于家闺秀的名义嫁给七十二世衍圣公孔宪培(1756—1793),此即于夫人。^①

在孔府档案、孔氏族谱中,于夫人实有其人,确系衍圣公孔宪培之妻。现存的历史遗迹,如孔府慕恩堂、孔林“鸾音褒德”坊等,也显示出她生前逝后享有格外尊荣。但已有学者指出,遍查乾隆帝诸女史料,并无一人嫁到孔府,而且也没有清朝皇帝认汉人为义女的典制支撑。^②单凭这两点,“公主下嫁孔府”之说已被动摇。然而,另有两个疑问尚未解答:一是于夫人生前真实处境究竟怎样?二是为何她逝后受到了非凡礼遇,以致被误认为是乾隆公主?

据史载,孔宪培与于敏中之女至晚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已定下婚事。^③乾隆三十七年(1772)底,孔宪培进京完婚,夫妇分别受到了乾隆帝与其母崇庆皇太后的召见和赏赐。这对孔府而言无疑是莫大恩荣,孔宪培之父、时任衍圣公孔昭焕为此曾连上谢恩折,以抒感戴之心。但深究其由,乾隆帝对孔宪培的关注,实际上其来有自,甚至有过“颇可成人”的赞誉。^④孔宪培之妻于氏,身为时任大学士于敏中之女,自也会因父之隆而备受朝野瞩目。《孔府内宅轶事》描述孔宪培和于氏结婚前,“从京城到曲阜,百官运送嫁妆每日不停,整整运了三个月;光是服装首饰就有上千箱,另外象人参、灵芝、珊瑚树、牙雕福禄、翠玉盆景等等,更是应有尽有”。^⑤作者或是想借此宏大场面来烘托于氏的

① 孔德懋《孔府内宅轶事——孔子后裔的回忆》,第24页。

② 杜家骥《乾隆之女嫁孔府及相关问题之考辨》,《历史档案》1992年第3期。

③ 骆承烈、朱福平、骆明编《孔府档案选》,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④ 《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衍圣公孔昭焕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资料号:04-01-14-0040-013。

⑤ 孔德懋《孔府内宅轶事——孔子后裔的回忆》,第25页。

“公主”身份却没有进一步深究,从而没有意识到于氏的特殊恩遇主要来自清廷对孔府和于敏中的双重加恩。

另外,《孔府内宅轶事》提到于氏嫁至孔府后,自恃毓德高门,“和婆母程夫人关系不好”,为此引起程夫人不满,后者还到乾隆帝面前告状,最终结果却是“乾隆对公主一向娇惯,现在她又远嫁山东,乾隆更是心疼,并没管教公主,只对程夫人说‘她的脾气一向如此,这不必说,我知道’。”^①这段叙述,意在渲染于氏的高贵身份,然而没有考虑到清代严格的召见礼仪和控告程序,不乏演绎成分。

历史真实情形是怎样呢?查阅相关档案,于氏与程太夫人确曾有过公开冲突,但发生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孔宪培去世之后。孔宪培和于氏因无子嗣,遂以胞弟宪增之子庆镛为继,是为七十三世衍圣公。孔庆镛袭爵之时甫及八岁,孔府诸多事务主要依赖于氏料理,由此埋下族内纷争的隐患。嘉庆三年(1798)程太夫人向山东巡抚伊江阿控告于氏偏信其侄、把控孔府大权等一系列“违礼”之举。经查,于氏被山东地方指为“不知大体,偏听挑唆,以致越礼远行,控争印信”,要求她将孔府事务暂交孔庆镛生父宪增代办,俟庆镛年至二十,再自行掌管。^②为此,嘉庆帝亦有专门谕示“于氏系原任大学士于敏中之女,此朕所素知。今因孔庆镛年幼,辄偏听家奴唆使,信用母家族属,以于氏之人干预孔氏之事,实属不合。”^③从地方官员到当朝皇帝,围绕于氏的措辞和处分不可谓不严厉,这不仅否定了于氏的“公主”身份,也直观说明她在孔府内的处境一度相当艰难。

尽管如此,于氏身为衍圣公孔庆镛的嗣母,对后者的恩德自是不言而喻:一是承祧之恩,一是抚育之恩。这也便可解释,道光三年(1823)于氏去世之后,孔庆镛特建慕恩堂,请人制作行乐图,还原孔宪培夫妇在世时的生活样态。^④道光五年(1825)清廷按照赐祭一品夫人之礼,为于氏建造“鸾音褒德”坊。所谓“鸾音”,乃指于氏生前多次“仰蒙孝圣宪皇后(即崇庆皇太后——引者注)慈宫宠召”,^⑤而非后人附会的那样以“鸾凤”来暗示于氏的“公主”身份。^⑥

至此,我们可以推断,《孔府内宅轶事》披露的“公主下嫁孔府”在历史上并不存在。作者只是根据于氏生前逝后的特殊恩遇,融入诸多得自风闻而未有实证的信息,“遥忆”出了这样一件所谓“历史事实”。王明珂论及“事实”与“记忆”之间的关系时说“无论是在新的、旧的、现代的、后现代的研究取向之下,历史事实是一位历史学者永恒的追求”;另外,“以‘记忆’观点来看待史料,我们或能发掘一些隐藏在文字与口述之后的‘史实’”。^⑦他通过比较自传、传记和口述历史三种形态的文本,认为它们在出版流传后均成为社会记忆的一部分,这种社会记忆以两种方式被保存和流传“首先,它以书的形式保留在图书馆、档案室与个人藏书中,形成一种静态的、绝对的社会记忆。其次,它们被有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读者阅读;读者对于书中所记载的‘过去’有不同的选择与诠释。然后,这些‘过去’又在不同的社会情景下,以各种方式被传述,如此形成一种动态的、相对的

① 孔德懋《孔府内宅轶事——孔子后裔的回忆》,第26页。

② 《嘉庆四年四月初三日山东布政使岳起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资料号:04-01-08-0159-018。

③ 《嘉庆四年五月初三日山东巡抚陈大文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资料号:04-01-08-0159-021。

④ 孔繁银《衍圣公府见闻》,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328—329页。

⑤ 《道光五年四月十九日衍圣公孔庆镛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资料号:04-01-14-0058-021。

⑥ 对“乾隆公主嫁孔府”之说持赞同态度的骆承烈就称“自古鸾指凤鸟,为百鸟之首。天子之旗称‘鸾旗’,皇后及公主出行称‘鸾驾’。”因此,他认为“鸾音褒德”中的“鸾”字也与皇帝有关。参见骆承烈《也谈“乾隆公主嫁孔府”说》,《齐鲁学刊》1986年第2期。

⑦ 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社会记忆。”^①

以此观之,“公主下嫁孔府”之说固然经不起严谨推敲,但它随着书籍出版、口耳传授、旅游讲解等途径而获得广泛传播,衍生出了更大范围内的“社会记忆”。不仅越来越多的读者开始信从书中所言,甚至连以前曾在孔府供职的一些老人,也以“据说”“传闻”等方式,接受了这一说法。^②后来,孔德懋主编的《孔子家族全书》中,多处以“信史”姿态呈现“公主下嫁孔府”,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记忆和认知。^③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在《孔府内宅轶事》出版前后,已有相当数量的孔府档案整理问世^④,讲求历史真相并不困难,却依旧无法阻挡人们(包括学者)征引书里观点,满足各自所需。^⑤

三、偏离史实:追忆“陶氏毒杀王氏”

在《大家来做口述历史》(Doing Oral History)这本口述史经典指南中,唐纳德·里奇注意到“口述历史和其他学科的研究资料一样,有可信的,也有不可信的。没有任何一种资料是绝对可以信赖的,任何资料都需要其他证据加以比对。”^⑥“不可信”的原因相当复杂,或由于年深日久致使受访者的记忆失误和不完全,或由于受访者的个人原因而故意歪曲真相,或受访者受到了访谈者的诱导、暗示或曲迎等,终而导致“过去的声音”变成了“现在的声音”。^⑦

类似复杂因素,集中体现在《孔府内宅轶事》中影响最广、争议最大的一个说法之上,即孔德懋继母陶氏“毒杀”其生母王氏之说。王氏去世时,幼年孔德懋生活在孔府,照理说具有相当可信度,但正如约翰·托什所提醒“个人回忆的生动性是口述证据的力量所在,也因而它的主要局限性所在。”^⑧这便要求我们从学术层面对其所述内容严肃对待。

书中所称陶氏,系七十六世衍圣公孔令贻(1872—1919)的继配夫人,终身没有子嗣。孔德懋连同其姊孔德齐、弟孔德成,均是孔令贻侧室王氏(名宝翠)所生。在《孔府内宅轶事》中,陶氏被刻画成了一个心计恶毒的悍妇形象;出身寒微的王氏则经常受欺侮,更因其在产下孔德成后不久便身故,愈增命运之悲剧色彩。在“母亲之死”小节开头,孔德懋写道“一想到我善良的,可怜的母亲,泪水就涌上眼眶。小弟出生第三天,我的可怜的母亲被陶氏毒死了。”^⑨关于陶氏强迫王氏“服毒”的经过,孔德懋作了如下描述:

① 王明珂《谁的历史:自传、传记与口述历史的社会记忆本质》,定宜庄、汪润主编《口述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3页。

② 曹海源、刘长厚口述《直接为衍圣公服务的厅、房及其属员》,张河、竹春整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曲阜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曲阜文史》第9辑,1989年印,第72页;孔繁银《衍圣公府见闻》,第324页;孔繁银、孔祥龄《孔府内宅生活》,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294页。

③ 刘厚琴《孔子家族全书·家族春秋》,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177页;李景明《孔子家族全书·家族世系》,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319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曲阜师范学院历史系等编《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全3编24册),齐鲁书社1980—1985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曲阜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孔府档案选编》(上、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⑤ 参见黄进兴《优入圣域》一书对《孔府内宅轶事》关于“乾隆公主嫁孔府”之说的引用和采信。

⑥ 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实务指南》(第2版),王芝芝、姚力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⑦ 张广智《论口述史学的传统及其前景》,《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⑧ 约翰·托什《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吴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0页。

⑨ 孔德懋《孔府内宅轶事——孔子后裔的回忆》,第63页。

突然陶氏端来一碗汤药给母亲,说我母亲睡觉时打哆嗦了,非要她喝下这药去……当时有个姓唐的老妈妈凑巧看见了,她见我母亲跪在床上哀求陶氏说她没病,不用喝药,陶氏当然不答应,非逼着她喝下去。我母亲喝完药,唐妈妈一直守在她床边,心里很难过。我母亲对她说“我活着也没好日子,我倒不怕喝这药,我就是想孩子,想看看孩子。”但这小小的要求也没满足,我的母亲临死前没能再看到我们,特别是我的小弟德成刚生下来就抱走了,她连一眼也没见到。^①

王氏身故之时,孔德懋尚不足三岁,那么上引这段细致的过程描述,当是她从那位“唐妈妈”口中得知或是由别人转述而来。然而,无论动机,还是过程,所谓“陶氏毒杀王氏”之说均值得深入推敲。

先说动机。孔德懋坚主陶氏毒杀王氏,理由是“在‘母以子贵’的封建家族中,‘小公爷’的出生必将抬高母亲的地位,这是陶氏所绝不能容忍的。”^②这一论述能否成立呢?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分析。一方面,王氏生下孔德成,延续“圣裔”血脉,无疑是孔府有功之人,其地位也会像孔德懋所说“必将抬高”;但另一方面,王氏地位抬高是否构成对陶氏的威胁,以至于陶氏“绝不能容忍”,甚至设法将其“毒杀”呢?恐怕也不尽然。须了解,孔德成诞生之后,最大的受益人乃是陶氏。因为孔府在长达数百年间一直严格实行嫡长子袭封衍圣公的制度,“只有在没有嫡生子时才可由庶生子继承(如德成),但顺由长房夫人领养,等于经过了一次‘立嫡’手续”。^③也就是说,陶氏“抱走”孔德成并加以抚育,是以“立嫡”的方式使其身份更具正当性,而陶氏仍然为孔府正室,有权在孔德成年少时主持府务。孔德成生母王氏的存在,不会危及正室陶氏在孔府中的地位。这与前述孔庆镕继嗣没有妨碍于夫人的地位是相同道理,陶氏自也不需要冒着很大风险,命人将王氏下毒加害。因此,所谓“陶氏毒杀王氏”的动机很难成立。

再说过程。根据孔德懋描述,协助陶氏毒杀王氏的关键人物是心腹本家孔心泉,此人最后畏罪自尽。^④对于此节详委,孔德成引用一位衍圣公府“随朝伴官”李传森之言,证明孔心泉很早之前就已去世,前任衍圣公孔令贻曾经主持其葬礼。^⑤既然如此,孔心泉就不可能参与数年后陶氏的阴谋。孔德懋还提到,母亲被害后,“陶氏让几个当差的在一天夜里不声不响地将母亲棺材从内宅后门抬出去,在孔林的一个角落草草掩埋,只一堆黄土,连墓碑也没有”。^⑥类似文字,进一步强化了王氏未得善终的悲剧场景,但是否果然如此,还需慎重看待。关于王氏去世,孔德成曾写过如下文字:

德成民国九年夏历正月初四日生。先生妣王太夫人,于是月二十一日卒。其疾,即今所谓之“产褥热”也。先继妣陶太夫人,殓以朱棺……及葬期,厝先公墓后……厝而不葬者,为待先继妣百年后,同合葬先公之墓,礼也。每岁清明、十月初一日(吾乡每岁扫墓之期)扫墓时,先继妣必令吾姊弟至先生妣厝前祭拜。^⑦

① 孔德懋《孔府内宅轶事——孔子后裔的回忆》,第64页。

② 孔德懋《孔府内宅轶事——孔子后裔的回忆》,第63页。

③ 邢铁《明清时期孔府的继承制度》,《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

④ 孔德懋《孔府内宅轶事——孔子后裔的回忆》,第65—66页。

⑤ 孔德成《吾家大事(选载)》,台北《传记文学》第53卷第3期,1988年9月。

⑥ 孔德懋《孔府内宅轶事——孔子后裔的回忆》,第64页。

⑦ 孔德成《吾家大事(选载)》,台北《传记文学》第53卷第3期,1988年9月。

这段文字告诉我们三点信息:第一,其母王氏死于“产褥热”,系正常死亡;第二,王氏去世后,陶氏为其妥善处理丧葬事宜;第三,每逢扫墓之期,陶氏均会命孔德齐、孔德懋、孔德成姐弟三人前往林中祭拜生母。与孔氏近支后裔往来密切的学者赵荣光,曾多方访查和了解有关陶氏的品性与作为,如其所说“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几年间,笔者遍访当时仅存的十余位公府知情人,却没有得到《孔府内宅轶事》一书中关于陶氏叙述的印证。最值得一提的是,孔府的最重要知情人之一,孔德懋女士姐弟的挚友刘三元先生也持完全否定说。同时,曾经给陶氏作过侍童的任庆生先生也没有可以支持《孔府内宅轶事》中陶氏形象的印象和证据。”^①此外,曾于1942年到孔府承启处任职的孔繁银,熟稔孔府历史和典故。他曾撰文描写孔令贻之妻陶氏与其妾王氏的关系,比如陶氏得知王氏有孕在身时,“她就告诉宝翠要保护好身体,保护好孩子。她还命中医大夫给宝翠试脉,吃保胎的中药”。^②而对于王氏产后身故是否与陶氏下毒有关,孔繁银则认为此乃道听途说,“没有真凭实据”。^③

上引论述,多出自与孔府和陶氏有密切关系者,他们所见所闻的陶氏形象,与孔德懋叙述的陶氏形象差别很大。对照之下,《孔府内宅轶事》关于“陶氏毒杀王氏”之事的描写,很难让人信为“历史事实”。所以,赵荣光评论说“由孔德懋之女柯兰女士‘整理母亲口述’而成的《孔府内宅轶事》一书,在讲述陶氏与孔府家事关系问题上显然失于历史眼光。”^④

何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按照“集体记忆”理论,记忆之形成离不开社会环境和社会群体的影响。^⑤但过于强调记忆的社会性,又容易遮蔽记忆的主体性,即如有论者说“不管是多么的准确和生动,他或她的记忆都渗透着随后的经验。他们也许会受从其他消息来源(尤其是媒体)获得的信息影响;他们也许会受怀旧之情(那时的时代是美好的)的左右,或为对儿童时期贫困的不满所扭曲,这种不满会影响他们随后的生活。”^⑥以此分析,孔德懋虽然生长于富贵之家,但幼时丧父亡母,姐弟相依为命,加之此后命运多舛,^⑦对旧式家族生活充满了强烈不满和批判。谈及出版《孔府内宅轶事》一书,孔德懋后来曾明确说“我以亲身经历的、世人鲜知的孔府内宅生活公之于众,一是为后人了解和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封建礼教提供佐证和参考,二是为了怀念七十多年前含冤死去的母亲。”^⑧这两层用意,前者是为批判,后者是为怀念,无疑会导致作者在叙述之时掺杂相当程度的主观情感。比如她提到母亲被陶氏“毒杀”后,偌大家族没有一人问津,由此认定“虽然这些自命以衍圣公的后代为荣的亲戚,是会虚伪地维护封建道德标准,标榜忠孝之道的,但他们出于私利,慑于权威而表现沉默。就做人的品质来说,孔府底下的那些愚忠的老仆们要比他们纯洁得多。”^⑨通过这样的论述,作者更多地是在发出她对母亲的无限同情和深切追念,折射出她重新回忆往事时的心态和情感,而不一定是历史真实场景的原貌呈现。

① 赵荣光《〈衍圣公府档案〉食事研究》,第109页。

② 孔繁银、孔祥龄《孔府内宅生活》,第225页。

③ 孔繁银、孔祥龄《孔府内宅生活》,第226页。

④ 赵荣光《〈衍圣公府档案〉食事研究》,第108页。

⑤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⑥ 约翰·托什《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第269页。

⑦ 孔德懋《孔府内宅轶事——孔子后裔的回忆》,第86、132、137页。

⑧ 邱健《孔德懋从圣府闺秀到社会活动家》,《炎黄春秋》1999年第9期。

⑨ 孔德懋《孔府内宅轶事——孔子后裔的回忆》,第64—65页。

四、夸大见闻:补忆“《子见南子》风波”

在历史学学科的意义之上,“口述历史主要是指运用口述访谈的方法获取口述史料,采集、整理与保存当事人(亲历者、见证者、受访者、口述者等)的历史记忆,呈现当事人亲历的历史真实”。^①之所以反复凸显“当事人”的重要性,或因很多口述文本中的信息并不尽然出自其亲历亲闻,而“仅仅是对自己所接受的书本知识和社会知识的记忆”;^②抑或当年某些事件发生时,口述者当时对此并未有深刻记忆,回忆时夸大了自身在其中的参与程度。《孔府内宅轶事》有关“《子见南子》风波”的描述,即可归于此类,值得加以辨析。

1928年,《奔流》杂志发表了林语堂的自编剧本《子见南子》。^③次年6月,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以下简称“省二师”)师生将此剧搬上舞台,因触及孔子形象问题,引来孔氏族人反对和控告。国民政府教育部、山东省教育厅派员调查,鲁迅等文坛名人发声表态,使之成为一件众所瞩目的焦点案件。案发之时,孔德懋年届十三,自言亲见亲闻了此事的前后经过,所以《孔府内宅轶事》专辟一小节“‘子见南子’的风波”,对此详细忆述。

根据孔德懋描述,1929年前后省立二师的学生运动蓬勃开展,师生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新高潮,他们编印小册子声讨孔府,提出“打倒孔陶氏”“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在那种环境下,孔府大门终日紧闭,作者自称“那时才十来岁,并不理解形势的严重,每日仍旧照常读书游戏”。虽然也看到陶氏总是焦虑不安的样子,族中长辈每日来府议事,但“对于他们所谈的事不感兴趣,也不大懂”。留下最深的感受是“对于陶氏每天这样忙碌,我们却很高兴,因为她没有心思过问我们,我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追跑嬉戏,也不必再防备她来训斥我们‘不安稳’了。”^④

后来,“听说学生们演戏了,戏名是《子见南子》”,由学生扮演孔子,且有女演员参加,“这更引起我们的好奇心,很想看看先祖在台上是怎样活动的。后来戏越演越热闹,听说二师给周翰博、颜翰博府里都发了票,每天演出数场,座无虚席,掌声不绝”。^⑤“听说”一词显示出她作为历史“亲历亲闻者”的特殊身份。但孔德懋到底是当时“听说”了外部动向,还是后来加工了这些信息呢?我们先来看看,孔德懋“亲见”的《子见南子》是如何上演的:

后来我们终于也看到了,记得是在双十节后的一天,家家门上挂的红灯还没摘。陶氏带我们姐弟到看台上去看戏,看台搭在孔府东学临街的土堆上。那土堆很高,站在上面可以看到墙外,戏台就搭在对面街上。我们坐在里面,看台挂着堂帘,外面的人看不到我们。现在回忆起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孔子出场时吓了我一跳,那样子和大成殿里孔子塑像截然不同,头上也戴冕旒,身穿大袍子,但抹着满脸锅灰,猥猥琐琐。有个大美人坐在佛龛上,珠佩叮当、光彩夺目,别人告诉我“她叫南子”。我还记得南子给了孔子一块绿玉,那是一块

① 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遗产研究所、澳门大学《南国学术》编辑部《2018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南国学术》2019年第2期。

② 刘萍《对口述历史实践的一些体会——以抗日战争口述历史为例》,周新国主编《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页。

③ 语堂《子见南子》,《奔流》第1卷第6期,1928年11月。

④ 孔德懋《孔府内宅轶事——孔子后裔的回忆》,第118页。

⑤ 孔德懋《孔府内宅轶事——孔子后裔的回忆》,第118页。

绿肥皂,我看的很清楚,当时我还嚷了起来。戏台上还有子路,和我平时所见画像也不相同,穿着大红袍子,红脸膛。我还记得孔子以手指天向子路高喊“天厌之、天厌之。”看戏时台下夹杂着观众的掌声和“打倒孔家店”“打倒孔陶氏”的口号声。我坐在陶氏身边,她一直不说话,我感觉到她浑身发抖,偶一回头,看到她脸色铁青。她那神情我至今不忘。^①

作者以“亲历者”视角,描写她所看到的《子见南子》演剧始末,既有舞台形象,也有观众反应,更不乏她自己所说“嚷了起来”的互动,各方面信息一应俱全,然而,核查相关材料,则会发现其间不乏讹误或夸大之处。

先说时间和地点。当时多方报道都提到,《子见南子》作为省立二师校内“游艺会”项目之一,于6月8日在该校大礼堂内排演,^②那么作者所说“双十节后的一天”“孔府东学对面的街上”等信息显然有误。而且,《子见南子》也只是在6月8日那天上演了一次,因为就在该剧公演后不久,孔氏族长孔传堃便联名族中二十余人,向国民政府教育部上书,控告“二师”校长宋还吾“言行均涉过激”、纵容学生亵渎先圣等罪状。为此,教育部于当月26日行文山东省教育厅展开调查。这也侧面证明,作者之前“听说”该剧“每天演出数场,座无虚席,掌声不绝”等场景,恐非历史事实。

再来看剧中孔子形象。接到孔氏族呈控后,教育部派出参事朱葆勤,会同山东省教育厅督学张郁光,驰赴曲阜了解情况。经查,“二师”虽然上演过《子见南子》剧目,但“扮演孔子脚(角——引者注)色,衣冠端正,确非丑末”,“该校教职员学生似无故意侮辱孔子事实”。^③后来关于此事还有一些讨论,证实《子见南子》剧中的确没有“丑末”孔子形象,其之所以引起争议,乃因以前从未有人在曲阜将孔子“编入剧曲,摹拟容声”而已。^④

综合当时多方记载,似乎难以找到孔德懋所“亲见”和描绘的《子见南子》演剧景象。作者虽然指出鲁迅曾将该案有关材料在《语丝》上发表过,^⑤但《孔府内宅轶事》在成书过程中应该没有仔细查阅这份杂志,否则断不会写下错误的时间、地点以及一些细节上的夸大之处。这种忆述失实,固然可以用年深日久、记忆有误等原因来解释,毕竟孔德懋回忆之时距离《子见南子》演剧风波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很难保证在各方面都记忆准确或周全,但倘若换个角度看,正如有人针对保罗·汤普森《爱德华时代的人》一书所作的评论和质问“在这么多年间,一些记忆已经消退,或也许至少受到随后经历的影响。他们的童年记忆,难道不是有很多是在他们年龄较大时回忆的产物吗?他们后来也许会读到的自传或小说难道不会强化某些印象而弱化其他印象吗?电影或电视节目难道不会对他们的意识产生某种影响吗?”^⑥由此向我们提示了另外一种可能,即孔德懋口述回忆中的《子见南子》演剧风波,某种程度上乃是后来随着此事在近代中国新旧转型方面意义的逐步凸显,忆述者把当时可能记忆并不十分深刻的事件而进行了有意夸大,“补忆”了自身在其中的参与程度和见闻感受。这种“补忆”,更多展现出口述回忆者对历史事件的当下认知和理解,而并不完全是历史事实的原貌呈现。

① 孔德懋《孔府内宅轶事——孔子后裔的回忆》,第118—119页。

② 《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生会通电》,《语丝》第5卷第24期,1929年8月。

③ 《教育部朱参事及山东教育厅会衔呈文》,《语丝》第5卷第24期,1929年8月。

④ 《教育部朱参事及山东教育厅会衔呈文》,《语丝》第5卷第24期,1929年8月。

⑤ 孔德懋《孔府内宅轶事——孔子后裔的回忆》,第120页。

⑥ 约翰·托什《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第269页。

结 论

上述案例引出了一个共同问题,即如何辩证看待口述文本和历史真实的关系。黄克武认为,“在经历每一个步骤的转移、操作之后,口述记录与历史真实之间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它可能一部分是历史的真实,一部分是事后想象、追忆、辩解、圆谎的结果。”^①左玉河将口述历史范畴中的“真实”分为四个层面:历史之真(客观的历史真实)、记忆之真(历史记忆中的真实)、叙述之真(音像文本真实)和口述文本之真(根据音像整理的口述文本真实)。从历史之真到口述文本之真,经历了三重帷幕的过滤。^②这些理论分析颇具启示意义,尤其促使我们思考,一份口述材料从“声音”走向“文本”,再成为阅读者、研究者案边的“史料”,所经历的过程十分曲折,影响其真实性的因素也非常复杂。那么,当面对一份业已出版的口述文本时,需要时刻保持警惕,立足多种档案文献去比证辨析其可信程度。

作为孔德懋早年生活的口述回忆,《孔府内宅轶事》固然提供了一些宝贵素材,丰富了我们对于区域社会史和孔氏家族史的了解,但其生成过程并不符合口述历史的基本规范,整理者也没有查核更多材料加以考辨,以致存在诸多错讹和失实之处,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该文本的史料利用价值。本文在梳理《孔府内宅轶事》形成过程和基本内容的基础上,着重选取“公主下嫁孔府”“陶氏毒杀王氏”“《子见南子》风波”三则典型案例,分别从“追忆”“追忆”和“补忆”的视角探讨口述回忆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偏离和矛盾,并尝试挖掘导致其失真的主客观因素。由此个案探讨,也可为当前中国口述历史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建设提供几点思考。首先,应注意和强调口述文本的形成过程是否符合相应规范(比如明确的访谈意识、音像设备的使用等),否则很可能弱化对历史负责的严肃态度和道德约束,催生出更多天马行空、恣意漫谈的文本材料。^③其次,越是声称“权威”“独家”的口述回忆,越需要谨慎对待。此类口述资料的唯一性,恰恰是其风险性所在,所以应参考其他材料进行多方比证,考辨分析。最后,当口述回忆偏离历史事实时,可以从记忆的观点出发,挖掘隐藏于文字与口述背后的“史实”,实现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贯穿对话。

(作者孔勇,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邮编:250100)

(责任编辑:尹媛萍)

(责任校对:敖 凯)

① 黄克武《语言、记忆与认同:口述记录与历史生产》,定宜庄、汪润主编《口述史读本》,第32页。

② 左玉河《历史记忆、历史叙述与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4期。

③ 论者认为,口述历史引入中国之初,为了扩大其影响,采取了广义的“口述历史”概念,有意识地降低了口述历史的标准和门槛。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口述史到了必须要强调规范化操作的新阶段。参见左玉河《多维度推进的中国口述历史》,《浙江学刊》2018年第3期。

and methodology , one can use images to collaborate with history or vice versa. In addition , both the ontological analysis of images and the discussion of their context are essential for us to bring images into history. In this process , in order to avoid falling into the traps and misunderstandings ,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image research , to grasp the images on their own as well as within their contexts , as comprehensively and accurately as possible.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appropriate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age documents and text documents. On the whole , image into history is not only a theory , method , and practice limited in the history discipline , but also a comprehensive research paradigm calling for multi-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The Turn of Liang Qichao's Worldview in His Later Years: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A Record of My Travel Impressions in Europe* // Ouyang Zhesheng

Liang Qichao formed his worldview gradually while observing the Great War in Europe. He participated in the debate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 and started to develop his worldview. After his return from Europe , he published *A Record of My Travel Impressions in Europe* and added new elements to this cultural debate. He demanded emancipation of mind , and advocated the rule of law , constitutionalism , autonomy , and national movements. He warned people not to rush , and he was against excessive nationalization policy in China. He called for a fus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in the future , arguing that China should take more responsibility in the world. These proposals were both new and constructive. It is neither appropriate to classify Liang Qichao as a cultural conservative nor placed him in the school of Oriental culture.

On the Formation of Oral Texts and Their Authenticity: A Case Study of *The Anecdotes in the Mansion of Confucius' Descendants* // Kong Yong

Oral history is an important genre that carries historical memory. To some extent , the authenticity and credibility of oral contents are predetermined by whether or not the recorders followed the standard procedures through which to preserve oral memories and form oral texts. Edited by Ke Lan , *The Anecdotes in the Mansion of Confucius' Descendants* is a text based on Kong Demao's oral recollection. Because of som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 many stories disclosed in this text are not quite true , which affects its value as historical source. This article selects three important cases , and argues that they are flawed. Two stories recorded in “The Princess married to the Kong Family Mansion” and “Madam Tao poisoned Madam Wang” are not in conformity with the facts , and the one in “Confucius's Encounter with Nan Zi” contains elements of errors and exaggerations. The three cases offer examples on the types of oral memories , from “remote memory” , “reminiscence” to “supplementary memory” . They reflect the speakers ' contemporaneous reflection of historical events rather than the authentic representation of historical events. And they also provide us with a sense of new “historicity”.

Local Complex and Theoretical Landscape: A Translingual Analysis of Modern Classic Village Culture and Its Historical Writing // Wang Tiangen

The issues concerning farmers , rural areas , and even agriculture are fundamental issues affecting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eople 's livelihood. These issues are related to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historical continuity and change. One needs to grasp the transformation and change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and even of tradition in order to select a topic for research of modern countryside. For example , in order to set up the logical correlations between historical knowledge and its discourse , one needs to be aware of the tendency of emotion or reason in the analysis of historical